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外国名著



□ 翟迈云

《常识》中的精神意蕴与品读价值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讲话中他提到，“中国人民一向钦佩美国人民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等著作”，他认为“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

《常识》中的政治智慧

《常识》的著者托马斯·潘恩是十八世纪末美国杰出政治思想家。潘恩初抵北美之时，北美正逐渐走向武装抗英之路，但“国王仁慈、议会暴虐”的思想在民间乃至军队中仍十分普遍；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甚至宣称完全忠于王室，依附英国。北美大陆虽有战争但没有革命。在这一背景下，潘恩先后出版《常识》《美国危机》等著作，为殖民地民众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其中，《常识》这本小册子，成为美国独立运动的第一面旗帜，使成千上万的北美人民成为独立事业的坚定拥护者。

《常识》富含进取精神，为北美独立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虽然美国抗英争取独立的斗争面临诸多困难，但《常识》打破了美国独立运动的重重思想枷锁。在书中，潘恩区分了社会与政府不同的起源与目的，通过揭露英国宪政的荒谬与腐朽，破除了北美人民对君权神授的盲从；潘恩还抨击了君主制与世袭制，指出国王的存在与天赋平权相悖，打破了北美人民对君主制的迷思；谈及美利坚所面临的形势，潘恩驳斥了北美大陆流行的和解幻想，点明为实现和平必须以暴力争取独立并进行政体革新，为北美人民的独立运动指明了方向；潘恩还将北美独立的有利条件与国际局势结合，肯定北美殖民地力量的强大与独立的可能，增强了北美人民的抗

英信心。《常识》鼓舞了北美人民的独立热情，促进了北美人民独立意识的觉醒，极大推动了北美的独立事业。

《常识》富有创造精神，是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启蒙之作。潘恩是北美最早公开提出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和制定共和宪法的人之一。在《常识》中，他创造性地为北美人民提供了一个联邦共和制方案。《常识》的创新之处还在于，与洛克等启蒙学者强调财产权，将没有财产的人排斥在公民权利之外不同，潘恩坚持无论财富多寡，都应人人平等的思想，革新性地提出建立广泛和平的代表制。通过抨击国王与贵族掌权的君主制政治体制，潘恩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民主共和政府观。《常识》不仅意味着西方政治制度史的一次重大突破，书中的创造精神还鼓舞了欧洲乃至世界人民的反封建斗争。

品读《常识》的重要价值

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同志谈及领导干部阅读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的重要性。他指出：“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作为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品读《常识》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对个人知识的扩充、天下情怀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

越是品读经典，越能拥有广博知识。一方面，品读《常识》能够增进对美国历史及政治文化的了解。潘恩既吸纳了欧洲大陆的启蒙思想，又融合了北美本土的民族主义，其思想呈现出鲜明的美国特色。另一方面，品读《常识》能够加深对美国政策传统的了解。《常识》中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了准确预示，预言了美国

发展方向。在潘恩看来，北美的真正利益在于拒绝与英国绑定，独立通商并获得自身政治经济发展，同时必须拥有一支强大海军。而不参与欧洲政治正是美国在独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贯彻的指导原则，对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维护也是其长期对外交往的重点，美国还建立起全球最强大的海军。潘恩持续且深远影响了美国政治决策者，对《常识》的阅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美国的行动逻辑。

越是品读经典，越能培育天下情怀、坚定中国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常识》这部反对外部干涉经典著作的品读，有助于培育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胸襟。《常识》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潘恩坚持了一种动态观念，他承认英国政体历史上的作用，但指出英国政体并不适合当时的北美。

青年尤其需要品读经典。正如《常识》中提到，青年时代是良好习惯的播种季节。应在青年时期培育起阅读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的良好习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学习读书的重要性，他认为“青年处于人生积累阶段，需要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他还勉励广大青年“特别是要克服浮躁之气，静下来多读经典，多知其所以然”。青年习近平正是在梁家河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博览群书，通读大量中国古代经典与外国文学名著。同时，青年时期所学的知识，往往能够使人受益终身。

《常识》等经典名著还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沟通的重要方式。国家友好，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年。探索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的新范式，可以以经典书籍为媒介，将相互了解深入到彼此历史与人文当中，推动文化交流尤其是青年文化交流。

（上接1版）我们高度重视党支部建在运动队上，并与相关单位共建党支部，相继开展运动队进军营活动，学习“铁军”精神和“空中拼刺刀”精神，切实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我们大力弘扬女排精神，进一步增强运动员为国而战、为国争光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我们激励广大冰雪健儿继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我们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持续组织开展相关教育实践活动，塑造新时代中国冰雪队伍的精气神。我们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为更好履行新时代冰雪运动发展的使命任务提供坚强政治思想保证。我们力争在北京冬奥会上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气提供强大正能量。

坚持底线思维，确保备战参赛顺利进行

扎实做好重大风险防范化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当前发展形势来看，北京冬奥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保持政治定力，树立风险意识，强化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国际涉冬奥政治斗争。我们主动阐明我国立场，有理有据有节开展国际体育斗争，坚决反对将体育政治化，反对针对中国的恶意抹黑。我们积极与国际奥委会、冰雪项目国际组织开展交流合作，主动争取国际组织对我相关情况的理解与支持，积极回应国外冰雪项目协会及友好组织提出的合理诉求，实现“国际冰雪朋友圈”的有效拓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强化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意识。“宁可不要金牌也不要兴奋剂”，表达了与兴奋剂问题斗争的坚强决心。我们高度重视反兴奋剂工作，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在东京奥运会实现了兴奋剂“零出现”。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冰雪项目反兴奋剂工作的监督检查，切实压实反兴奋剂工作主体责任，厘清责任链条，确保反兴奋剂工作各环节过程清晰、责任明确。我们积极构建反兴奋剂预防教育体系，实行网格化管理，设立反兴奋剂专员，加强反兴奋剂教育，推进反兴奋剂风险突击检查常态化。在接下来备战攻坚的最后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要以百倍的警醒和更加严格的管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中国体育代表团干干净净地参加北京冬奥会。

全方位全环节做好疫情防控。当前，在世界疫情多发的大背景下，我国疫情防控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突出强化疫情防控责任，尽最大努力赢得疫情防控的胜利。我们聚焦队伍备战，采取周全之策，按照“一队一策”“一事一策”“一场景一策”的要求，制定周密的防护、隔离和救治的方案、预案，把疫情对训练备战工作的影响降到最低，全力做到“零感染”。我们针对在外比赛的队伍，正在以及即将参加国内举办的测试赛、国际训练周的队伍，加强全流程的桌面推演，细化疫情防控措施，提高运动员、教练员和相关人员的防疫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避免造成非战斗性减员。

展示负责任大国良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冬奥会“将进一步激发中国民众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情，带动更多中国人关心、热爱、参与冰雪运动，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和奥林匹克精神传播作出积极贡献”。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既是中国对国际奥委会和世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也代表着我国对办好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坚定信心和美好愿景。我们将抓住冬奥会机遇，尽一切努力，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充分展现我国制度优势和新时代大国形象。我们将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我们将秉持“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积极应对全球性问题与挑战，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北京冬奥会序幕即将拉开，决战决胜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刻苦训练、背水一战，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全力做好最后冲刺阶段的各项备战参赛工作，努力交出北京冬奥会精彩答卷，为实现“全项目参赛”“办赛精彩参赛出彩”奋勇拼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以优异的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文化的极大差异。以文字为例，就目前所见，战国文字写法多种多样，如楚文字的写法飘逸潇洒，与秦文字的朴实无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后果，便是大一统观念的弱化。秦始皇通过统一度量衡与文字，最大限度地消除了这种文化差异，使得大一统观念再次成为整个中国思想观念的主流，这对于后世中国多元而不分裂的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无疑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对后世中国的深远影响

秦在统一之后仅仅存在了十五年，二世而亡，但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有“百代都行秦政法”之说。概括而言，秦代对于后世的影响主要有二，即治国制度与向心观念。

在治国制度方面，以上已有言及，主要是郡县制与律令体系。秦始皇在六国故地强力推行郡县制，意欲彻底打破之前延续的分封制传统，实现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强力管控，这一精神被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虽然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政策的实行有所变动，例如汉初实行郡国制、西晋大封诸王等等，但是总体看来，由中央直接派遣官员治理地方是一种为历代王朝所默认的政治规则，并成为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之一。

在律令体系方面，虽然汉代对于秦法多有批判，但其对于秦法的改变主要是针对法令的具体内容，在制度上则仍然沿袭了秦人的律令体系。这一点在张家山汉简等出土文献当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律令体系在秦代之后，历经两汉与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最终在唐代达到巅峰，从而形成了闻名于世的中华法系。

秦代制度的延续与发展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深入社会各个阶层的对于国家的向心观念。秦代从制度和文化上彻底改变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纷争带来的文化分裂趋势，使得大一统的观念重新深入人心，并依托整个国家体制得到空前的加强。在秦代以后，社会各个阶层均对中央保持着极强的向心力。这正是古代中国数经乱世而未分裂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格局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

始皇帝与中国的统一

□ 黄 海

“端平法度”“同书文字”——政治统一与文化整合

有李悝、吴起等人尝试变法，建立集权体系，但这些尝试均未彻底打破旧有的传统。秦国之所以能够打破一切传统，顺利建立集权体系，一方面是因为秦本身处于边鄙，虽然自建国以来一直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其周围异族也有很多，故而其旧传统不似中原各国那样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孝公时期国家面临的严峻局势，使得秦国为了生存与强大，不得不尝试这种崭新的体制。

这一尝试无疑是成功的。孝公在位时期，秦国改变了“诸侯卑秦”的局面，逐渐成为一方强国。商鞅所确立的体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与组织整个国家，保证国家的每一个人均可以在耕战中发挥作用，这种组织上的优势无疑是宗族势力尚存的关东诸国所不具备的。

虽然秦国相比于关东诸国，有更成熟的条件完成“周秦之变”这一历史使命，但这一转变过程仍然极为波折，受到了旧有传统的强烈反弹。商鞅变法在刚开始时，便受到了旧贵族的极力反对。之后，虽然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商君之法得以执行，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仍然存在极大的阻力。最终，在孝公去世之后不久，商鞅便被新君处死，这一反弹也由此达到了极致。

商君之死，在极大程度上抵消了打破旧有传统所带来的怨气。在商君被处死之后，孝公之子惠文王继续坚持实行新的体制，便已不再有大的阻碍。最终，因为律令制度下的集权社会无与伦比的组织力，秦人在几代君主之后，便由始皇帝消灭了六国，一统天下。而“周秦之变”这一历史巨变也告完成。

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对当时的社会从政治与文化两方面进行了全面整合。在政治方面，这种整合主要表现为郡县制与律令体系的推广；在文化方面，则主要表现为度量衡和文字的统一。

所谓的郡县制，便是在地方设置郡、县二级行政区划，由中央派遣官员治理。与之前的分封制相比，郡县制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度，是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的重要政治制度之一。在始皇帝一统天下之初，对于六国故地是否应继续推行郡县制，曾经有过一番讨论：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讎，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丞相绾等人认为，六国故地广大且远离中央，应当采用分封制以方便治理，而李斯则坚决反对，认为分封制会造成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力，不利于中央集权。秦始皇最终采

纳了李斯的建议，并在之后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通过郡县制在全国的推行，秦代中央政府实现了对地方的强力管控，使得分封制造成的地方离心力不复存在，并让整个天下对中央产生了极强的向心力，从而真正实现了海内一统。

在郡县制的基础之上，秦人进一步通过律令体系治国。律令体系的思想基础是商鞅变法带来的法家思想，主张凡事皆依照法令，《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帝“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正反映了这一点。在律令体系之下，所有国民的一切行动均需依照法令而行，否则便会被处罚，这便是琅刻石所谓的“除疑定法，咸知所辟”。由此，我们可以想见，秦朝的律令数量一定极为庞大，立法工作一定极为频繁，正如汉朝人所言，“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通过出土文献，我们对于秦朝这种庞杂的律令系统可以有一个直观的了解。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出土了天下闻名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其中包含大量的秦朝律令，例如《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等，另有解释法律的《法律答问》《封诊式》等，其中的律令涉及包括经济、文化、军事、司法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见秦法数量之众。

在文化方面，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伊始便“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统一了度量衡与文字，改变了自春秋战国以来诸国异制的情况。就始皇帝本心而言，其统一度量衡与文字或许更多考虑的是政治统治的需要，但这一举措实际上深深影响了秦代及其之后的思想观念。战国时期，诸侯交争，造成了各国